

毛泽东思想 的双重渊源

汪澍
著

厦门大学出版社

汪澍白 著

毛泽东思想 的双重渊源

厦门大学出版社

〔闽〕新登字 09 号

毛泽东思想的双重渊源

汪澍白 著

*

厦门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福建省新华书店经销

三明地质印刷厂印刷

*

开本 850×1168 1/32 5.5 印张 2 插页 137 千字

1993 年 10 月第 1 版 1993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3000 册

ISBN 7—5615—0694—5/D·40

定价:3.00 元

目 录

毛泽东对前代兵家韬略的批判继承	(1)
毛泽东对孔子的评说	(22)
毛泽东对《红楼梦》的评说	(30)
菊香书屋的读书生活	(38)
“两论”与苏联三十年代哲学著作的关系	(49)
两类矛盾学说的演变	(118)
船山学说对青年毛泽东的影响	(132)
胡适对青年毛泽东的影响	(144)
青年毛泽东政治理论取向的转变	(158)
后 记	(173)

毛泽东对前代兵家韬略的批判继承

“毛泽东同志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是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战略家和理论家。他虽然在‘文化大革命’中犯了严重错误，但是就他的一生来看，他对中国革命的功绩远远大于他的过失。他的功绩是第一位的，错误是第二位的。”

这是《中共中央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对毛泽东所作的总体性的历史评价。在这里，马克思主义者所表征的是其思想体系的根本属性。革命家、战略家、理论家，则表征其在政治上、军事上、理论上的杰出成就。将这三方面加以比较，毛泽东在政治上和理论上都有功有过，唯独军事上他白手起家，以弱胜强，几乎终生没有犯过战略性的错误。而且他还系统地总结了我国长期革命战争的经验，形成了独具特色的战略战术思想，蔚为军事学史上的一朵瑰丽奇葩。

毛泽东的战略战术，主要是他创造性地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在总结长期革命战争经验的基础上形成的。同时，也不能忽视，他对中国古代兵家韬略作了深入钻研与批判继承。1939年1月，毛泽东在给何干之的一封复信中谈及研究中国史时，曾表示：“我则有志未逮，我想搜集中国战争史的材料，亦至今没有着手。”^①他虽然未暇写出中国战争史的专书，但却留下了精湛的军事理论著作与丰富的作战经验，从中不难探寻出其批判继承前代兵家韬略的

^① 《毛泽东书信选集》，第136页。

源流与重点。

(一)

毛泽东自幼同情贫苦的下层群众，具有反抗强暴的叛逆性格。这是他乐于接受兵家文化的内在心理基因。从“指点江山，激扬文字”的学生时代，直到“长缨在手缚苍龙”的战争岁月，他从自发到自觉地继承前代兵家韬略，大体上有四条渠道。

第一，以战争为题材的通俗小说

从读书识字开始，毛泽东最爱看的就是那些以战争为题材的通俗小说，诸如《三国》《水浒》《西游》《封神》《说唐》《岳传》等等。

《三国演义》是民间艺人根据《三国志》的史事，通过“讲史”“说书”敷演成文，而由罗贯中定稿的小说名著。由于魏、蜀、吴三方的矛盾错综复杂，曹操、诸葛亮、周瑜……一时英才辈出，权谋韬略，雨覆风翻。加上这本书的战争描写又出色当行，因而历来为兵家所称道。清朝开国时，甚至敕命将它译成满文，备八旗将校参考。一些崛起草泽的农民领袖，也奉之为用兵的宝鉴。黄人《小说小话》里这样写道：“张献忠、李自成及近世张格尔、洪秀全等初起，众皆乌合，羌无纪律，其后攻城略地，伏险设防，渐有机智……。闻其皆以《三国演义》中战案为玉帐惟一之秘本。”^①刘銓《五石瓠》与张德坚《贼情汇纂》中的记载与此略同，^②不必尽述。

毛泽东少年时既未研读过六韬三略，一朝起兵造反，自然乐于从早岁熟读的《三国演义》等小说中吸取和运用其作战经验。据说

① 转引自游国恩等主编：《中国文学史》第4册，第27—28页。

② 见李锐：《毛泽东早年读书生活》，第25页。

在开辟井冈山根据地时，他曾因从土豪家中搜获一部《三国演义》而欣喜逾恒。但这一点，后来却为“左”倾教条主义者所诟病。1932年临时中央转移到中央根据地，不但剥夺了他的军事指挥权，而且还在报刊上发表文章，指责他“把古时的《三国演义》无条件地当作现代的战术；古时的《孙子兵法》无条件地当作现代的战略；更有好些博览的同志，拿半个世纪以前的曾国藩作为兵法之宝。”^①又指责“毛泽覃同志特别爱好《三国志》，《三国志》似乎是毛泽覃同志‘战略与策略’的根据。因为他曾把《三国志》中许多‘锦囊妙计’，运用到实际中去，结果犯了严重的恶果。”^②名为批判毛泽覃，实则将矛头指向毛泽东。明眼人一看便知。

其实，毛泽东在成为马克思主义者以后，虽是读通俗小说，也总是带着批判的眼光。他曾经独到地指出，《三国演义》的作者罗贯中没有继承司马迁的传统，而是继承了朱熹的传统，这句话就具有深刻的意蕴。

司马迁的《史记》虽是封建时代写的历史书，但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具有一定的人民性。司马光主编《资治通鉴》，其体例不同于《史记》，但仍贯穿着实事求是的精神。至朱熹改写成《资治通鉴纲目》，便舍弃实事求是原则，而刻意讲求所谓春秋大义。朱熹于三国中，确认刘备是正统，曹操是僭国，自汉献帝“建安二十五年以后，黜魏年而系汉统”。后来罗贯中写《三国演义》，继承了朱熹的“义法”，尊蜀汉而抑曹魏，斥黄巾为盗贼。毛泽东在《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一书中肯定黄巾起义的历史功绩。他还多次赞扬曹操，深情怀念“魏武挥鞭，东临碣石有遗篇”^③的千年往事。这种态度同朱熹和罗贯中的“义法”是针锋相对的。

① 《论战术战略的时代性与我们红军目前对于战术战略认识问题》，见《革命与战争》第1期。

② 《红色中华》第92期。

③ 《浪淘沙·北戴河》，见《毛泽东诗词选》，第81页。

除《三国》以外，其他以战争为题材的历史小说，毛泽东也广为搜罗。1936年，他曾电嘱李克农从国统区买回蔡东藩编写的《中国历代通俗演义》，整套五百多万字。1947年从延安撤退时，还设法将这套书带了出来，至今保存在菊香书屋。

《三国演义》虽以战争为题材，但它的主角大抵是帝王将相。唯有《水浒》写的是一群打家劫舍的强盗。正如作者在“排座次”一回中所赞叹的：“其人则有帝子神孙，富豪将吏，并三教九流，乃至猎户渔人，屠儿刽子，都一般兄弟称呼，不分贵贱。”毛泽东的心从小就同这些“八方共域，异姓一家”的江湖豪杰息息相通。及至他自己上山造反并成为革命领袖以后，1944年在延安看到根据《水浒》故事改编的京剧《逼上梁山》，更特地写信向改编者杨绍萱、齐燕铭说：“历史是人民创造的，但在旧戏舞台上（在一切离开人民的旧文学旧艺术上）人民却成了渣滓，由老爷太太少爷小姐们统治着舞台，这种历史的颠倒，现在由你们再颠倒过来，恢复了历史的面目，从此旧剧开了新生面，所以值得庆贺。”^①

毛泽东好读《水浒》，除了为梁山英雄的造反精神所激励以外，也从英雄们扎寨聚义、计赚智取中识得一些用兵的韬略。在青年时代，大概还是不自觉地“识得”，待到后来驰骋疆场，就往往能自觉地加以化用。如在《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中，他引述“林冲棒打洪教头”的故事来阐明战略退却的积极作用；在《矛盾论》中，他又借用“三打祝家庄”的故事来说明全面认识敌我双方实际情况的重要意义，都是信手拈来，恰到好处。

除嗜读《水浒》外，毛泽东在延安时，曾对米脂人李建侯写《永昌演义》殷殷关注；^②“文革”期间，又对《李自成》的作者姚雪垠破格加以保护。足见其对反映农民战争经验的新作，寄予何等挚切的

① 《毛泽东书信选集》，第222页。

② 《毛泽东书信选集》，第230页。

期待！

第二，湘军与太平军的作战经验

洪秀全所发动的太平天国革命是中国历史上规模最大的一场农民战争。曾国藩通过创建湘军扑灭太平军，将他自己塑造成了中国封建社会的最后一尊精神偶像。自清末以至民初，朝野人士大都赞誉曾氏为“立德、立功、立言”三不朽的人物。

毛泽东求学于湖南一师时，杨昌济老师曾劝勉他以曾国藩为学习榜样。他也确实听老师的话，下功夫研读过《曾文正公家书》《曾文正公日记》。现在韶山纪念馆还收藏着《家书》（光绪年间传忠书局木刻本）的第四、六、七、九卷，每卷的扉页上都有他亲手所写的“咏芝珍藏”。1917年8月23日，他在致黎锦熙的信中写道：“愚于近人，独服曾文正，观其收拾洪杨一役，完满无缺。使以今人易其位，其能如彼之完满乎？”^①他佩服曾国藩，特别是佩服曾氏统领湘军与太平军作战所取得的圆满胜利。

为什么湘军能取得圆满胜利呢？毛泽东在同一封信中写道：“欲动天下者，当动天下之心，而不徒在显见之迹。动其心者，当具有大本大源。”^②他认为曾国藩就是“独得大本”的人物。

曾国藩创建湘军时不仅面对着农民起义的冲击，而且还遇到西方列强的浮海入侵。为了维护摇摇欲坠的封建统治，他在《讨粤匪檄》中惊呼：“举数千年礼义、人伦、诗书典则，一旦扫地荡尽。此岂独我大清之变，乃开辟以来名教之奇变。”在内忧外患的双重危机面前，他高举保卫纲常名教的旗帜，动员士大夫阶层和“乡野老实之人”，组建湘军出战。曾氏治军重视倡学攻心，用人强调忠义血性，因而能转移风气，挽狂澜于既倒，节节赢得镇压太平军的胜利。

五四以后，毛泽东走上了与曾氏截然相反的革命道路，道路虽

^{①②} 《毛泽东早期文稿》，第85页。

则不同，湘军与太平军作战的经验，仍有可资借鉴之处。1926年，他在农民运动讲习所讲课时说：“洪秀全起兵时，反对孔教提倡天主教，不迎合中国人的心理，曾国藩即利用这种手段扑灭了他。这是洪秀全的手段错了。”^①对洪秀全发动农民战争，他是肯定的。对洪氏不谙悉国情、不顺应人心而被击败，他又深为扼腕叹息。

1927年的“八七”会议之后，毛泽东受命回湘发动秋收起义。初战受挫，他毅然率部进驻井冈山，开创了第一个农村革命根据地。为了加强军队建设，他又手订《三大纪律·六项注意》（后来发展为八项注意）。三大纪律是：“行动听指挥；不拿工人农民一点东西；打土豪要归公”。六项注意是“上门板；捆铺草；说话和气；买卖公平；借东西要还；损坏东西要赔”。

《三大纪律·六项注意》无疑是根据实践的需要而提出的，但也不能忽视它特有的文化渊源。曾国藩当年组建湘军时，作过一首《爱民歌》，也提了六项注意，其第一项是：“第一扎营不要懒，莫走人家取门板；莫折民房搬砖石；莫踹禾苗坏田产；莫打民间鸡和鸭；莫借民间锅和碗；莫派民夫来挖壕；莫到民家去打馆；筑墙莫拦街前路；砍柴莫砍坟上树；挑水莫挑有鱼塘，凡事都要让一步。”耐人寻味的是，毛泽东和曾国藩起兵时，都手订了六项注意，其第一条注意项目都落在门板上：一个叫“上门板”，一个叫“莫取门板”，若合符节，似乎不完全是巧合。

《爱民歌》主要是为改善军民关系而作。至于用兵的韬略，曾国藩、胡林翼各具卓识，其论点散记于奏折、文告、家书、日记中。流传最广者莫如曾氏《家书》，内中既道及了湘军的战略部署，也探讨过太平军和捻军的用兵之道。后文将要谈到，毛泽东在制定红军的战略与策略时，从双方都得到许多借鉴。

辛亥革命前夕，蔡锷在云南任协统，为训练官兵而从曾胡遗著

^① 《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资料选编》，第195页。

中撷精取粹，编为《曾胡治兵语录》一书。蒋介石主办黄埔军校，又将《语录》加上自己的序言，作为教材，人手一册。在后来的工农红军中，总司令朱德是蔡锷将军旧时部曲，各级指挥员出身黄埔者亦所在多有。因此，《曾胡治兵语录》在红军中颇有市场，毛泽东对此书也相当推重。“左”倾教条主义者从庸俗社会学的观点出发，竟将借鉴曾胡作为毛泽东的一条罪状，这该是何等幼稚可笑！

第三，被称为“相斫书”的史鉴

毛泽东小时上私塾就点读过《左传》、《史记》、《纲鉴易知录》。到长沙入学，又自学过《御批通鉴辑览》、《资治通鉴》、《读史方舆纪要》。那时，他就养成了好读史鉴的习惯，并写道：“吾人揽史时，恒赞叹战国之时，刘项相争之时，汉武与匈奴竞争之时，三国竞争之时，事态百变，人才辈出，令人喜读。”^①可见，战争和动乱，正是他读史的兴奋点。

据日本学者统计，有文字记载的 5560 年人类历史中，共发生战争 14500 次。在此期间，中国从夏代至明代发生战争 3000 余次，清代及近现代，战争更为频繁。大略估计，发生在中国的战争约占全球战争总数四分之一以上。而且，中国人有重史的传统，史书对历次战争的纪述相当详实。从三国以来，《左传》就被称为“相斫书”。梁启超又在《中国史学·中国史界革命案》中说：“昔人谓《左传》为相斫书，岂唯《左传》，若二十四史，真可谓地球上空前绝后之一大相斫书也。”梁氏的论断容或有些夸大，但战争描写是史鉴诸书的显要内容，殆无疑义。人们通过阅读史鉴，自不难从中学得一些用兵的韬略。

毛泽东既稔熟古代史鉴，兴奋点又集中于战争描写。因此，当他投身武装斗争时，自然会将从读史中识得的用兵韬略化用于自

^① 《毛泽东早期文稿》，第 186 页。

己的指挥艺术之中。特别是他自撰《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论持久战》等名著,采取历史与现实相结合的方法,深刻地分析了历史上的若干战例,与中国革命战争的实战经验相印证,说明强弱与攻防可以互相转化的道理,更大大地鼓舞了革命斗志和提高了我军的战略思想水平。

在延安时,毛泽东还认真钻研了当代史学家郭沫若、范文澜等人的著作。1944年3月,郭沫若为纪念李自成攻入北京三百周年而作《甲申三百年祭》。毛泽东读后致书郭氏说:“你的《甲申三百年祭》,我们把它当作整风文件看待。小胜即骄傲,大胜更骄傲,一次又一次吃亏,如何避免此种毛病,实在值得注意。倘能经过大手笔写一篇太平军经验,会是很有益的;但不敢作正式提议,恐怕太累你。”^①可见,他对研读当代史论,尤其是对从农民战争史中吸取经验教训,给予了格外的重视。

1949年进北京以后,毛泽东定居于中南海的菊香书屋。书屋最大的一项基本建设,就是一套线装本《二十四史》,共八百五十册,四千万字。他身居党和国家领导人的高位,于日理万机之余,竟然挤时间把这部书从头到尾通读过一遍,某些部分还读过多遍。如1959年在上海主持八届七中全会期间,就重读了《三国志》的《郭嘉传》和《明史》的《海瑞传》,并向到会干部推荐这两本书。直到晚年病魔缠身,还在《晋书》上留下了“1975.8再阅”、“1975.9再阅”的笔迹。

配合通读《二十四史》,他又重新翻读了《资治通鉴》、《续资治通鉴》、《纲鉴易知录》诸书。特别是《资治通鉴》,经常搁在床头,书页都被磨破了。晚年他对陪侍在侧的护士孟锦云说:“你知道这部书我读了多少遍?一十七遍,这恐怕是最后一遍了。”^②

① 《毛泽东书信选集》,第241页。

② 郭金荣:《毛泽东的黄昏岁月》,第98页。

毛泽东晚年不仅嗜读史鉴，而且对战争描述的特为关注，也一如既往。兴来时往往会随手写下自己的感想。张贻玖写的《毛泽东读史》一书，有“批注历史战例”一栏，缕举了“孙臆，攻魏救赵，因败魏军，千古高手”；“臧质，一解汝南之围，二胜盱眙之敌，三克刘劭之逆”；“刘彧，内线作战，以寡对众，以弱敌强而取胜，‘可谓奇矣’”；“后唐灭梁说明：‘审机独断，往往成功’”；“契丹善用‘诱敌深入，聚而歼之’的战术”等五例，^① 虽未窥全豹，但亦可见其一斑。

第四，中国兵家宝典《孙子兵法》

公元前 722 年至前 211 年，是中国历史上一个战乱频仍而文化又异彩纷呈的时代。在此数百年间，周朝王室衰微，诸侯割据称雄，春秋五霸、战国七雄，相互兼并，战争此伏彼起。同一时期，在欧洲和中近东地区，也赓续出现大规模的征战。诸如亚述战争、希波战争、伯罗奔尼撒战争、亚历山大·马其顿的东征，以及罗马和迦太基的两次布匿战争等。战争的实践推动着军事思想的发展，并形成了东西两大分支：欧洲和中近东地区，在战术方面有长足的进步；中国则对战略与策略有较深入的钻研。《孙子》、《吴子》及《司马法》均于此一时期问世。特别是《孙子兵法》，诚如兵家所云：“前孙子者，孙子不能遗；后孙子者，不能遗孙子。”它堪称是中外兵书中最古老而又最富于生命力的一部。

毛泽东研读《孙子兵法》究竟起于何时呢？从现在所掌握的材料来看，1914 年他写的《讲堂录》中有读魏源《孙子集注序》的多条笔记。其中就含有孙子语录。如：“百战百胜，非善之善者也；不战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谋攻篇》）“乱生于治，怯生于勇，弱生于强。”（《兵势篇》）魏源的序言认为《周易》、《老子》都是“言兵之书”，而《孙子》则是“言道之书”。魏源抓住这三部书的共同点，指

^① 张贻玖：《毛泽东读史》，第 119—141 页。

出：“夫经之《易》也，子之《老》也，兵家之《孙》也，其道旨皆冒万有，其心皆照宇宙，其术皆合天人，综常变者也。”这是相当独到的见解。它表明军事理论可以上升到哲学高度，哲学理论也可以实用于军事战略。毛泽东晚年提出“老子是一部兵书”，这种观点可能在早年读《孙子集注序》时就已萌发。

在学生时代，毛泽东已熟读《易》、《老》，而未及《孙子》^①；待到后来上山打游击，又很难找到《孙子》这本书。但他在战争实践中总结出来的作战经验，有许多地方与《孙子》不谋而合。“左”倾教条主义者便想当然地指责他是靠《孙子》来指挥作战的。直到长征过后，他才有机会真正读到《孙子》，难免有相见恨晚之感。1936年他写《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便多处引用《孙子》的理论来总结中国革命战争经验，诸如《军争篇》的“以逸待劳”，“避其锐气，击其惰归”；《始计篇》的“攻其不备，出其不意”；《谋攻篇》的“知彼知己，百战不殆”，等等。他并不是简单地袭取其词语，而是深入地领会其精神，多方将自己的实战经验与古代兵家的权谋韬略互相印证与发明，使之上升到新的理论高度。

《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指出：“一切带原则性的军事规律、或军事理论，都是前人或今人做的关于过去战争经验的总结。这些过去的战争所留给我们的血的教训，应该着重地学习它。这是第一件事。然而还有一件事，即是从自己经验中考证这些结论，吸收那些用得着的东西，拒绝那些用不着的东西，……这后一件事是十分重要的，不这样做，我们就不能指导战争。”^②这就表明，对古代兵法也应有扬有弃，作批判的继承。即令《孙子兵法》，也并非字

① 1956年12月21日毛泽东在《同哲学工作者谈话》中说：“我本来没有读过军事书，读过《左传》、《资治通鉴》，还有《三国演义》，这些书都讲过打仗……”。

② 《毛泽东选集》合订本，1966年版，第174页。

字珠玑。比如它把战争说成是“掠乡分众，廓地分利”；^①“掠于饶野，三军足食”，^②就表现出剥削阶级的掠夺性，扭曲了正当的军民关系。“愚士卒之耳目，使之无知”；“若驱羊群，驱而往，驱而来，莫知所之。”^③这更是赤裸地宣扬愚兵政策，扭曲了正当的官兵关系。这些都是《孙子》的糟粕，为革命家所不取。毛泽东在他的著作中强调：“军队的基础在士兵”，^④“战争的伟力之最深厚的根源，存在于民众之中”，^⑤只有摆正官兵关系与军民关系，才能充分发挥人民战争的革命威力。

由于时代和立场不同，毛泽东与孙子的战争观在基本点上是对立的。但是，这并不妨碍他们在战略与策略上可以有继承性的联系。日本的军事理论家小山内宏在其所著《现代战争论》中指出：“毛泽东的战略，是从其弱者的艰苦的斗争中创造和发展起来的卓越的战略，它与孙子的战略一脉相承”。这话说得相当中肯。

(二)

毛泽东半生戎马，除解放战争后期外，他所掌握的军力在全局上总是处于弱势，同敌军相差悬殊，乃至不堪匹敌。但是，经过二十年的苦斗，竟取得化弱为强，旋乾转坤的胜利。更为可贵的是，他还融汇古今兵家韬略，系统地总结了革命战争取胜的经验，形成一整套军事辩证法理论。这一套理论体大思精，兹仅就其与古代兵家韬略的继承关系，举要作四点说明。

第一，同许多前代农民战争一样，毛泽东以游击战起家，但他善于根据战争实力的变化，对游击战、运动战、阵地战三种作战形

①②③ 《孙子兵法》，《军争第七》，《九地第十一》，《九地第十一》。

④⑤ 《毛泽东选集》合订本，1966年版，第500页，第501页。

式灵活地加以运用。

首创井冈山根据地时，幼小的红军处于白军的四面包围之中。1928年，毛泽东就根据敌强我弱的实际情况，提出打游击战的十六字诀：“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这个口诀当然是从实际斗争中摸索出来的，但也的确融汇了前代农民战争的难苦经验。

井冈山上以前有个朱老聋子（朱孔阳），长期占山为王。他对付官军的口诀是：“不要会打仗，只要会打圈。”毛泽东和朱德都了解并介绍过朱老聋子的经验。毛泽东还作了补充：“既要会打圈，又要会打仗。……强敌来了，先领他兜个圈子，等他的弱点暴露出来，就要抓得准，抓得狠，要打得干净利落，要有缴获。”^①

曾国藩在《家书》中描述过与太平军作战的情况：“我进则彼退，我退则彼又进，顽钝诡诈，揉来揉去，若生手遇之，或有破绽可伺，则彼乘隙而入。”^②《家书》还谈到捻军作战的特点：“此贼故智，有时疾驰狂奔，日行百余里，连数日不少停歇；有时盘于百余里之内，如蚁旋磨，忽左忽右。贼中相传秘诀曰：‘多打几个圈，官兵之追者自疲矣’。”^③所谓“贼中相传秘诀”云云，实即太平军与捻军的谋略。毛泽东早年就研读过曾氏《家书》，十分留意湘军与太平军、捻军的作战经验。待到他亲自带兵打仗时，这些经验自然都成了他制定战略战术的参照系。

毛泽东作《星星之火，可以燎原》，总结打游击战的经验，除了“十六字诀”以外，还提到：“固定区域的割据，用波浪式的推进政策。强敌跟追，用盘旋式的打圈子政策。”^④所谓打圈子政策，正是前代农民战争的传统。

① 韩伟：《毛委员教导我们用兵作战》。

②③ 《曾国藩全集·家书》，第337页，第1311页。

④ 《毛泽东选集》合订本，1966年版，第107页。

1930年,红军根据地由井冈山转移到赣南闽西,队伍和领土都扩大了。从变化了的情况出发,红军在作战形式上,转而以带游击性的运动战为主。第一次反“围剿”的龙岗之战,是由游击战向运动战转变的里程碑。据郭化若回忆,毛泽东曾说这次战役采用了太平军“五瓣莲花抄尾阵”的打法。其兵力部署是:前面一支先扎定,左右两支兵钳住敌人,另外一支兵迂回敌后,这就叫抄尾;还有一支预备队,准备随时接应。^①这次运动战迅速全歼包围圈内的敌人,活捉敌军前敌总指挥张辉瓒,战果十分辉煌。以后的第二次至第四次反“围剿”,都采用了这种运动战的作战形式。

到了抗日战争时期,毛泽东发表《论持久战》,认为抗日的持久战将经历三阶段:“第一阶段,运动战是主要的,游击战和阵地战是辅助的。第二阶段,则游击战将升到主要地位,而以运动战和阵地战辅助之。第三阶段,运动战再升为主要形式,而辅之以阵地战和游击战。”^②后来八年抗战的实践证明他的论断不愧为科学的预见。

进入解放战争时期,我军战争实力已大大增强。因此,毛泽东提倡大规模的运动战,结合开展阵地战,逐步夺取敌人的据点和城市。但是,各个阶段与各个战场上的情况不完全相同,这就决定着战略和战术的特殊性。如1947年3月我军撤出延安前后,东北和华北我军正以大规模运动战的方式,开始战略性的反攻,但西北战场却继续采取积极防御的战略和带游击性的“蘑菇”战术。毛泽东在《关于西北战场的作战方针》中写道:“我之方针是继续过去办法,同敌在现地区再周旋一时期(一个月左右),目的在使敌达到十分疲劳和十分缺粮之程度,然后寻机歼灭之。我军主力不急于北上打榆林,也不急于南下打敌后路。应向指战员和人民群众说明,我

① 见郭化若:《远谋自有深韬略》,第31页。

② 《毛泽东选集》合订本,1966年版,第488页。